

丛书策划与组织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编 汪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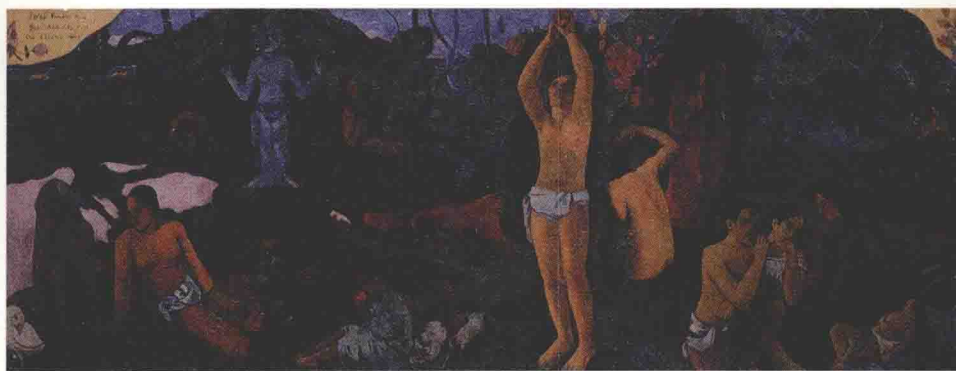
生命本身的政治

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

[英] 尼古拉斯·罗斯 (Nikolas Rose) 著 尹晶 译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生命本身的政治

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英] 尼古拉斯·罗斯 (Nikolas Rose) 著 尹晶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64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英）罗斯（Rose, N.）著；尹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301-24957-4

I. ①生… II. ①罗… ②尹… III. ①生命-科学-研究 ②生物工程-医学工程-研究 IV. ①Q1-0 ②R3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953 号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opyright © 200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生命本身的政治：21 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

著作责任者：[英]尼古拉斯·罗斯 著 尹 晶 译

责任编辑：张丽娉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957-4/B·122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pkupw@qq.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7.5 印张 380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致 谢

几年来我与众多其他学者展开对话与合作，本书中的观点由此而形成。我尤其要感谢BIOS研究网络的成员给予我的支持，该研究网络始建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在金史密斯学院参与研究的同事，尤其是玛丽亚姆·弗雷泽和莫尼卡·格雷科。我还要感谢莫妮卡、爱普·海伦和玛丽安娜·瓦尔韦德，他们帮忙组织了2002年9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BIOS生命政治研讨会——该盛会聚集了大批杰出能干的学者，他们均在研究生命科学所涉及的社会方面的问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有幸在BIOS中心热心帮助我的研究团队工作，该中心致力于研究生物科学、生物医学、生物科技与社会，并且我能够参加了BIOS举办的许多振奋人心的讨论会和研讨会。我想感谢帕特·斯帕洛内，她积极地投身于BIOS早年的发展；感谢萨拉·富兰克林，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写的这本书的进展之中：她慷慨地付出了大量时间来阅读各章的草稿，跟我详细地讨论各章内容，借我书籍和论文，指点我阅读文献，要不是她，我就会错过这些文献。我多希望我能够循着她提供给我的更多线索进行彻底的研究。

跟我合作的研究学生和博士后研究员总是在激发我的思维，我尤其要感谢卡洛斯·诺瓦斯，他不仅要求我跟上他大量的阅读，跟上研究的实验要求，而且还非常慷慨地向我提供他的思想。最近以来，感谢费丽帕·科尔内留森、克里斯·汉密尔顿、安妮特·V. B. 延森、克斯汀·克

莱因、林赛·麦戈、大卫·鲁比、阿约·瓦尔伯格,以及斯科特·弗里科基本上让我掌握了最新信息。我还要感谢我的哥哥史蒂文·罗斯,他一生都在跟我争辩其中的许多问题:受在他的实验室洗刷仪器的美好经历影响,我到苏塞克斯大学读生物,在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雕像的脚下学习我的专业遗传学。这么多年来,我同史蒂文和我的姐夫希拉里·罗斯讨论了本质论、还原论、遗传学、神经科学和生物政治学等问题,尽管我们的观点有很多分歧,但他们坚持不懈的批评声音总是会给我启发: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侵入了他们的领域并根据一种不同的逻辑来对之进行分析。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感谢保罗·拉比诺对我的友情,感谢他强烈的思想刺激,感谢我们之间激烈的讨论以无数的方式让我的思想更加纯熟。

这本书的大概想法来自为1999年6月24日到26日在热那亚的圣玛格丽特(Santa Margherita)举行的讨论会所写的一篇论文,该研讨会的主题是“政治的置换”(Displacement of Politics),由萨克里·哈尼恩和亚历山德罗·拉戈组织。该文后来以“生命本身的政治”为题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01年第18卷第6期上(第1—30页,之前的一个版本翻译为意大利文,发表于*Aut Huit*, 2000, 298: 35—62)。不同的版本分别在巴斯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和东伦敦大学宣读,2000年5月在哥本哈根大学宣读,在2000年9月赫尔辛基大学举办的“幸福的精粹”(The Ethos of Welfare)研讨会上宣读。我要感谢那些邀请我的学者——巴里·巴恩斯、肯尼思·赫尔特奎斯特(他的早逝令我们无比悲伤)、迈克·鲁斯汀、巴里·理查兹、莱娜·奥托、莱娜·科克和爱普·海伦,感谢那些提供意见让我的论点更成熟的学者。我尤其要感谢我的那些丹麦朋友,尤其是健康、人文和文化小组(Health, Humanities and Culture Group)和乌费·尤尔·延森,他们在知识和烹饪方面的启发在很多方面都有助于我的思考。我将来自这些论文的材料紧

密结合为本书的第一和第二章。这些章节和导言还借鉴了我2003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宣读的一篇题为《二十一世纪的生命政治》（“The Politics of Lif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中的内容，因此我要感谢英德帕尔·格雷沃尔及其同事邀请我到欧文分校，感谢劳伦斯·科恩和王爱华邀请我到伯克利分校。

第三章脱胎于一篇题为《正在出现的生命形式》的论文，我是在2003年10月11日—13日第一届布兰肯塞研讨会“正在出现的生命形式：走向生命科学人类学”上提交的该论文。感谢斯特凡·贝克和米基·克内希特邀请我参加该研讨会，感谢他们让我在我的讨论中使用该研讨会的标题。

第四章和第五章大部分内容脱胎于我和卡洛斯·诺瓦斯合写的论文。我校订了这些文章，以说明哪些方面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并且指出了他特殊的贡献，但是这些文章都是我们两个共同构思、共同写出的。我感谢卡洛斯慷慨地让我以本章的形式将它们展现出来。第四章来自卡洛斯·诺瓦斯和尼古拉斯·罗斯的《遗传风险和身体个体的诞生》（“Genetic Risk and the Birth of Somatic Individual”），《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2000年第29卷第4期，第484—513页。第五章来自为2001年4月布拉格研讨会准备的一篇文章，该研讨会由王爱华、斯蒂芬·科利尔和保罗·拉比诺组织，主题为“Oikos and Anthropos：理性、科技与基础设施”（Oikos and Anthropos: Rationality,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后来我和卡洛斯·诺瓦斯以《生物公民身份》为题发表，载于王爱华、斯蒂芬·科利尔主编的《全球组装：作为人类学问题的科技、政治和伦理学》（*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牛津：布莱克威尔，2005年，第439—463页）。

第六章源于BIOS中心2003年5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维尔康姆

信托基金会协办的一场关于“基因组医学时代中的种族”的研讨会。虽然我并不期待很多与会者同意我的分析，但是我要感谢那些自各国而来参加两天密集讨论的学者，是他们让我们可能展开了这样一场讨论，该讨论超越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千篇一律的回应，而美国的讨论就是这样千篇一律的回应。该论文较早的一个版本在2004年4月耶鲁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宣读过，因此，我想感谢保罗·吉尔罗伊和阿朗德拉·尼尔森的邀请和盛情款待，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倾听我的论点。

在这些年，第七章曾以各种形式出现过：最初的版本是1998年为“当前研究历史小组”（History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Group）准备的，后来于1999年5月提交给了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感谢玛丽亚姆·弗雷泽对我的邀请，感谢所有那些在各个版本的写作过程中帮助我修改论点的学者。

第八章一个更早的版本发表为《有罪生物学：生物学文化中的病态身份》（“The Biology of Culpability: Pathological Identities in a Biological Culture”，《理论犯罪学》[*Theoretical Criminology*]，2004年第4卷第1期：第5—34页）。感谢我的好朋友帕特·奥马利建议我写这篇文章，感谢该期刊的编辑和审阅人提出的意见。

我还借鉴了其他已发表和未发表过的文章：《生物学时代的常态与病态》，*Outlines*, 2001:19—34（*Outlines*是北欧的一本跨学科社会学期刊，英文发表）；《二十一世纪的生命政治——研究计划笔记》（“Bio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tes for a Research Agenda”，*Distinktion*, 2001, 3: 25—44）和《神经化学自我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Neurochemical Self”），该论文是为关于“社会科学、精神病学、生物学”（Social Sciences, Psychiatry, Biology）的系列研讨会准备的，巴黎大学心理健康和精神病药物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troics），2002年5月5日；《当今的生物伦理学政治、生物医学化、

社会矛盾与生新的生物伦理学政治》(“The Politics of Bioethics Today, Biomedicalization, 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Bioethics”), 维也纳, 2002年10月;《当今的生命权力》(“Biopower Today”, 与保罗·拉比诺合写);《生命政治: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健康、医学与生物经济学》(“Vital Politics: Health, Medicine and Bioeconomic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伦敦经济学院, 2003年9月5—7日;《生物学时代对风险个体的控制》(“Governing Risky Individuals in a Biological Age”), 2004年2月南安普敦皇家精神科医学院法医部门年会开幕主题演讲;《控制意志》(“Governing the Will”), 2004年2月在慕尼黑和牛津宣读, 2004年4月在普林斯顿宣读。

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玛丽·莫雷尔, 她对最后演化为这本书的观点非常感兴趣, 感谢弗雷德·阿佩尔在本书的审查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性指导, 感谢那些匿名审阅人, 他们的批评迫使我阐明了我的论点。

从这些致谢(这份致谢并不完善, 我向那些我没有提到名字的学者表示歉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的著作极为仰仗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 他们像我一样认为在生命科学和政治近期的发展过程中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政治上、伦理上——正在形成规模, 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丰富多样、富有成效, 我才有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我并不想说本书中的观点是原创的, 但是如果我成功提炼出了一些概念, 而这些概念能够在短时间内以一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有助于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 那么它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尼古拉斯·罗斯

伦敦

缩 写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FM	法国肌萎缩协会
CAG	“三联体”，包含构成DNA的四个核苷酸的三个核苷酸序列：C（胞嘧啶），A（腺嘌呤）和G（鸟嘌呤）。有时这样的三联体会重复出现：CAGCAGCAG……当这样的重复异常多时，人们就会患上某些疾病，比如亨廷顿症。DNA分子所带有的所谓的“遗传密码”由三核苷酸单位构成，这样的三核苷酸单位由四种碱基组合构成：A（腺嘌呤），T（胸腺嘧啶），C（胞嘧啶）和G（鸟嘌呤）。
CAN	当今自闭症治疗
CHADD	儿童和成年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CNS	中枢神经系统
CSF	脑脊液
DAN	“现在战胜自闭症！”
ECT	电休克治疗
EEG	脑电图
ELSI	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首字母缩略词，尤其涉及将来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小额基金分配给关于基金定序的研究）

FMRI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GAD	泛焦虑症
GAIC	遗传学与保险委员会
H _{AP} M _{AP}	单体型测绘。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由来自加拿大、中国、日本、尼日利亚、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和资助机构合作开展，以开发一种公共资源，该资源将帮助研究者利用一种单体型测绘技术找到与人类疾病、与对药物反应相关的基因（参见 http://www.hapmap.org/ ）。
HD	亨廷顿症
IP	知识产权
IVF	试管受精
LS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MIND	“心灵组织”，英国全国心理健康协会现在的名称
NAAR	自闭症研究联盟
NAMI	美国的精神病联盟
NGRI	因精神错乱而无罪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DA	掌上电脑
PET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
PGD	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MDD	月经前焦虑障碍
PXE	弹性痣，一种遗传病，影响身体某些部位的结缔组织
RCT	随机对照试验
SANE	“精神分裂症，一种全国性急症”（英国的心理卫生慈善组织山恩）
SARS	重症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SNP	单核苷酸多态性
SNRI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剂
SPECT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化断层显像
SSRI	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
TMAP	德州药物算法项目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WHO	世界健康组织

目 录 |

致 谢 _001

缩 写 _006

导 言 _001

关于“现在”的描绘_005 / 变化_006

第一章 21世纪的生命政治 _011

医学——过去和现在_011 / 分子生命政治_013 / 最优化技术_018 / 主体化与意
索政治_026 / 生命本身的专家_032 / 生物经济学：生命力的资本化_037 / 超越
社会学批判：生命本身的政治学_046

第二章 政治与生命 _049

生命_049 / 生命与非生命之间_057 / 政治_059 / 生命政治_062 / 优生学_065 / 人
口_076 / 灵活的优生学？_081 / 风险_082 / 新的牧师职责_085 / 生命规范和社会
规范_089

第三章 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 _091

一个新时代？_097 / 易感性_099 / 增强_113 / 绘制新兴的生命形式_124 /

第四章 有遗传风险 _127

身体个体_131 / 遗传风险简史_135 / 遗传歧视_139 / 遗传责任_149 / 基因人
格——一种新的本体论？_153

第五章 生物公民_157

构成民族_164 / 制造生物公民：从公共价值到生物价值_167 / 生物社会性：主动生物公民_171 / 组织希望_176 / 生产生物价值：让道德准则、健康和财富成为现实_178 / 先进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的生物公民身份_183

第六章 基因组医学时代的种族_185

种族与生命权力_192 / 差异基因组学_199 / 健康研究中的种族分类_204 / 生物社会性_207 / 基因组身份和民族_210 / 药物基因组学和药物的种族化_214 / 结论：种族与当代生命权力_219

第七章 神经化学自我_223

超越笛卡尔_224 / 让异常心理可见_229 / 将精神病学诊断分子化_236 / 解码命运_243 / 服用抗精神病药物_249 / 神经化学公民身份_257 / 神经政治学_262

第八章 控制生物学_269

一种新优生学？_272 / 案例_275 / 专家_283 / 预防犯罪、公共健康和保护社会_289 / 新的控制生物学_297 / 一种批判性的控制生命政治学？_300

后记 身体伦理学和生物资本的精神_303

尾声_310

注 释_312

英文版参考书目_374

名词索引_409

译后记_425

导 言

20世纪末，许多人预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生物技术世纪”，一个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的时代。¹有些人认为人类基因组的定序会开创一个基因操控的时代，其后果是不可思议，甚至骇人听闻的。通过将基因组学与生殖技术方面的发展——比如胚胎植入前的遗传诊断和基因克隆——联系起来，他们设想出一个由基因工程人（engineered people）构成的世界，他们拥有的品质和能力是按照要求制造出来的。另外一些人认为新一代的精神药物很快就能让我们随意设计我们的情绪、感情、欲望和智慧。还有一些人想象战胜了死亡，想象了一个人类寿命无限延长的世界。他们所举出的许多生物医学技术大家都已耳熟能详：遗传筛查、生殖技术、器官移植、有机体的基因改造，以及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药物，这方面人们通常给出的例子是百忧解。据说另外一些技术“即将问世”：基因工程、异种移植、根据每个个体被编码在微型芯片上的基因型特制的个体化用药、在试管内或利用可被分化为任何一种组织的干细胞制造或更新器官。

这些可能性引发了希望和恐惧、期待和不安、赞颂和谴责等诸多情绪。虽然有些人对治疗各种疾病和痛苦的新的有效方法寄予厚望，但另一些人却提醒我们要防止将人类生命当做可以无限塑造的东西，尤其是在受孕治疗或受孕实验中创造和使用人类胚胎。许多政治家、大学、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希望这些生物医学上的发展将产生珍贵的知识资产，推

动一种新的、利润极高的生物经济，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基础科学正被收买为利润服务，这些关于少数疾病治疗法的研究会推动事业的发展、产生可观的利润，但那些影响多数人的健康和疾病、不太有吸引力的因素则被忽略了。他们特别挑出制药公司进行批评，指责它们以飞涨的价格出售许多新药，并做出虚假承诺，却忽视了药品可能会产生的危险副作用，还指责它们用医学方法处理非疾病状况，如脱发或性冷淡，从而在不懈地追求股东价值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市场。在许多国家，涉及遗传学的生物医学发展都是极具争议的，引起了人们对于基因歧视和优生学的恐惧，尤其是在考虑用胚胎选择来避免遗传疾病的情况中，以及有可能确定疾病的遗传基础的研究中，甚至在寻找导致个体在药品反应中出现差异的基因变异的药物基因组学中。

政治家、监管者、神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都已被卷入这些争论之中。政府已经制定法律限制其中的某些发展，尤其是那些和人类生殖中的遗传选择相关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成立了促进会或委员会来设法满足这些可能性带来的似乎不可避免的要求——在被允许的、被控制的和被禁止的发展之间“必须画出一条界限”。一些压力集团发起了运动，支持取消限制，从而使可能给他们所爱的人带来希望的研究得以进行。其他团体则发起了要求加强限制的运动，尤其是要保护卵子从受精、甚至从那之前开始的“生命的神圣性”。有些人希望通过诉诸某种超验的宗教道德或人类本体论来解决这些争论。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些问题是社会的，是会引发重大后果的，是环境形成的——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这些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令人烦恼的状况中，要对胚胎的选择、实验的进行、药物的批准、生命的结束做出决定，在每个这样的情况中，谁应该有权力做决定？业已诞生一个健全的行业，一个正在发展的“神经伦理学”领域——生物伦理学，对这些问题进行仲裁。有些人提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一些“超人类主义者”怀着相

当强烈的渴望欢迎这一前景，另一些人对此的反应却是痛苦和惊恐。许多知识分子都被吸引到了这场争论之中：弗朗西斯·福山、利昂·卡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只是那些试图建立规范界限的人中最知名的人物，他们认为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样的介入与非人类的生命有机体的关系，对人类进行的这些介入都是对我们人性的侵害——对他们而言，人的尊严、身份，也许还有人本主义本身的命运都依赖于人性本身的不可侵犯性。我们冒着极大危险篡改我们的“本性”，这危险最终会危及人的灵魂。(Fukuyama 2002, Habermas 2003, Kass 2002,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U.S.]and Kass 2003)。

本书既非对未来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也非对现在进行的生命伦理思考。的确，这样的思考和思索正是我试图分析的对象。它们本身——它们对未来的展望，它们的恐惧和希望，它们的评价和判断——是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中的要素。² 这种生命形式的政治，这一“生命政治”(vital politics)正是本书的重点所在。当然，政治长久以来一直在关注那些被统治者充满生机的生命。冒着过分简化的危险，可以说18、19世纪的生命政治是一种健康政治——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政治，关于疾病和传染病的政治，关于管制水、污物、食物、墓地的政治，关于那些聚居于城镇的人们具有的生命力的政治。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种对生理体质的遗传和不同亚族群的差异生殖所造成的后果的特殊理解进入了这一对居民健康及其质量的关注，这似乎迫使许多国家的政治家试图以种族未来的名义控制居民质量，通常采用强迫的、有时是凶残的方式。但是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生命政治看起来相当的不同。它既不受疾病和健康两极限制，也不致力于消除病变以保护民族的未来。相反，它关注的是我们不断增强的能力，即控制、管理、制造、重塑、调节作为活生生的生物的人类具有的生存能力的的能力。如我所表明的，它是一种“生命本身”的政治。³

虽然这一当代生命政治中有许多主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还有一些是新的。一部分新颖性在于政府理性和技术方面更加普遍的转变，特别是在提供安全、福利和健康方面——这关系到给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带来的难题——的改变，以及新的“先进开明的”政府技术的出现（Barry et al. 1996, Rose 1989, 1996a, Rose and Miller 1992）。尤其是这些都涉及对政府权力进行重组，管理人类健康和生育的责任，在整个20世纪都是政府机器的责任，现在要将这些责任转移给准自主性的监管团体——比如生命伦理学委员会；转移给私人公司——比如私人生育诊所和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直接出售给客户像基因检测这样的产品；转移给由审计、标准、基准和预算这些强有力的方法来“遥”控的专业团体——比如医疗协会。这些在政府理性和技术方面的改变还包括越来越强调个体在以下方面负有的责任，即管理自己的事务，谨慎地着眼于未来获得自身的安全。在健康领域——在这个领域，患者越来越被迫切地要求成为医疗服务和产品（从生殖技术到基因检测）的积极、负责的消费者——这些是最为显著的（Rose 1992, 1999）。这种复杂的市场化、自主化和责任化赋予先进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当代生命政治一种独有的特色。

除了这些转变之外，也许当代生命政治的新颖性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种“阶跃变化”，我们拥有的操纵自己的生命、发育、新陈代谢、器官和大脑的能力出现了质的增强。这一阶跃变化需要尺度的变化。目前正在成形的生物医学知识和技术具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它们有一点相同：现在人类生命是在分子层面被理解的，其过程可以在分子层面被仔细分析，同时生命也是在分子层面上被操纵的。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的生命力似乎不存在神秘的或不可理解的东西——基本上，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都能被适当地介入，从而为我们想要我们自己和孩子成为什么人这一愿望服务。因此，